

# 论清代江南家族女性的空间书写

娄欣星

〔摘要〕 不同的时空环境可以孕育不同的人格特质和地域特性,家族女性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江南特定的文化景观。特别是到了清代,江南家族女性依赖其独特的从宦、谋生以及结社经历,创造了多样的空间书写类型,进而形成了个性化的空间书写特征,表现出审美对象的多样性以及审美感受的丰富性。“空间形态”已逐渐成为家族女性的一种“生存形态”,在空间互动中表达女性复杂的生命体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不同空间以及不同空间内自我身份的认知,充分展现个体的思想认识和生命价值。同时,江南家族女性的空间书写也进一步深化了女性文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成为女性文学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证明。

〔关键词〕 清代;家族女性;空间书写;审美价值

时间与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双重维度,表现在文学地理学上,即体现为“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的内外互动与交融。由于各地域开放性和封闭性的差异,导致文学地理统一与多样的并存。基于对文学地理的空间结构、表现形态等内容进行系统准确的定位和研究,各文学板块呈现出鲜明的区域特点,影响着作家的精神品格、气质内涵、价值取向、表达方式等主观世界。而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必然会呈现出这个地区的独特风貌,同时也影响文学作品中文学个性化风格的形成。人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直接影响了空间的形式、功能和意义。一方面,空间作为一种地域维度,具有物质性、客观性以及现实性的存在形式。而人在地理空间中的实践,其主导特征就是流动。另一方面,空间又是一种精神维度,通过互动性的社会关系以及话语建构,不仅赋予了空间主体化、个性化意义,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作家空间文学的创作实践。

清代江南众多文学家族女性群体的涌现是清代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焉。然其学风所衍,又自有分野。”<sup>①</sup>乾嘉时期江南政治经济的繁荣稳定,思想环境的开放和自由为女性文人群体的涌现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同时在家庭教育积极培养和推动下,文学家族内女性文人群体创作活动呈现出格外繁荣的景象,向我们展现了女性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文学创作的发展特性。可以说,江南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孕育了诸多世家大族,而家族

娄欣星,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杭州 310028)。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清代环太湖流域才女结社研究”(19YJC751023)研究成果。

①梁启超:《饮冰室全集·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第十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页。

中女性文人群体的出现更是时空环境孕育出的独特产物。以江南的核心区域——环太湖流域<sup>①</sup>为例,据笔者统计,该地域在清代共有40个文学家族女性群体<sup>②</sup>,其中24个小型女性群体,14个中型女性群体以及2个大型女性群体<sup>③</sup>。在空间分布上,环太湖流域文学家族女性群体分布中心在于苏州府的吴江县与常熟县,以及常州府的阳湖县与武进县,占到总数的一半。“乾嘉之际,国运方盛,士大夫多优游于文学,而仓山碧城诸人,又复提倡风雅,故妇女作家,亦多如过江之鲫。”<sup>④</sup>这些女性群体多形成于康熙年间,乾嘉道时期盛极一时,向我们展现了家族女性生活的复杂面貌和文学创作中空间书写的独特属性。而基于地域空间的流动以及精神空间的互动关系,家族女性通过一定的空间生产和实践,试图确立属于她们的书写方式,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探索。

## 一、多样化的空间书写类型

现实空间并非是一种静态的、模式化的存在,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流动中完成的。流动,作为空间实践的外在特征,最直接的表现为主体的自由流动,以及由于主体的流动而带动的空间关系的流动。女性在家内的生存空间,需要她们扮演好“贤内助”的角色以及履行“主中馈”的职责,然后在此基础上获得文学创作的机会和权利。而由于生活空间的限制,家族女性所能够接触到的文学创作素材和经验也大都局限于家庭内。因此,家外流动空间的拓展成为家族女性提升自我,展现才华,获取更多创作灵感的重要途径。

### (一) 玩赏过程中的空间书写

诸多家族女性都曾有过相约友人登山吟咏、泛舟湖上,欣赏景致并交流感情的活动经历。女性独自出游已成常见之事,正如恽珠所言:“平生多游兴,到处望烟峦。”<sup>⑤</sup>(恽珠《崑山驿晓发》)纪游诗即是此类“赏心游”的最好反映,如陆卿子《西湖行》、毕慧《重到武昌节署书所见》、黄媛贞《春日行》、黄德贞《望海潮·乍浦天妃宫观潮》、孔继瑛《游大明湖》、庄德芬《过青墩将游青山庄,为雨所阻》、曾懿《送孟昭大姊归新都同游桂湖时值中秋桂花正开》、刘汝藻《偕伯嫂虞霭仙游大树园》、王慧《暮春同羽卿游虞山》等等。而“女伴相邀结胜游”<sup>⑥</sup>(毕智珠《踏青词》)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如张绉霄《偕沈月舫夫人游惠山》、孔素瑛《和闺友松筠来游小园韵》、黄德贞《万斯年·偕女伴游鸳湖》等。吴江沈氏、叶氏两大家族中的女性文人曾在汾湖之滨分题唱和:

麦陇新翻小绿柔,隔溪啼鸟弄芳洲。青山晚色花浮影,暮色微风月入流。共羨仙舟遥忆李,最怜顾曲元闻周。吴宫歌舞重回首,樽酒何年续胜游。<sup>⑦</sup>  
道出闺秀文会时,麦陇新绿,畔鸟啼鸣,一副春色盎然的景象。而日近傍晚时分,又是另一番光景。不禁羡慕李白,吴宫歌舞,樽酒胜游之情怀。似是借春日之景及古人之情,表现众人游玩唱和之兴致。

万历四十六年(1618)秋,叶绍袁在南京参加科考时,沈宜修和张倩倩曾离家两日,泛舟夜游吴山,此诗即描述两人湖上对饮畅谈之事。沈宜修的其他诗作,例如《春游有感寄赠周姊》《舟行晚归》

①环太湖流域指苏州、常州、湖州、嘉兴四地。

②文学家族女性群体是指在直系血缘关系中出现两代及以上知名文学家的家族中涌现出三个及以上女性文人的群体。环太湖流域文学家族内出现女性文人群体的共有40家,其中苏州20家,常州10家,嘉兴6家,湖州4家。

③考虑清代女性文学发展的现状,通过观察和衡量这些文学家族女性群体在代际延续长度上展现的生命力,将这些群体分为三类:2世及以下者为小型群体;3世以上、5世以下者为中型群体;6世以上、10世以下者为大型群体。

④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纲》,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374页。

⑤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一百八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163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第409页。

⑥[清]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0页。

⑦[明]沈宜修:《鹁吹集》,《午梦堂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3页。

《舟行即事》《月夜舟行》《薄暮舟行惠山》《七夕后一日柏舟垂虹有感》《春日舟行》《岁暮舟行》等，都记载了自己的“赏心游”经历，这种闲游，已无四季、早晚之分，颇具自主意味。

江苏太仓王氏家族的王慧，性好山水，“早岁一渡江至维扬，晚数至武林，及越州，探西湖、南屏、兰亭、禹穴之盛，并见诸留题”<sup>①</sup>。江苏昆山余氏的余希婴“每当村境闲寂，波光潋潋时，驾小舟相过从，而弟切齐亦跌宕自喜，奇情横溢，三人坐对，剪烛论诗画，及古人事，眸光紫然，辄漏五下，犹闻谭噓。声过者，初不信为从父姊弟也”<sup>②</sup>，都在一定意义上呈现了家族女性游心所致的文学创作活动。

传统时节如除夕、元宵、寒食、七夕、中秋等成为闺秀出游的好时机。如沈宪英《水龙吟·胥江竞渡》、曾彦《苏州七夕同子馥泛湖》、俞庆曾《清明日湖上书》等。

客情眷佳节，理棹泛江阴。遥波澄夕霁，霞彩媚枫林。城阙霭暮光，长烟引岨嵒。芳甸散兰息，高树噪栖禽。皦皦河汉辉，脉脉双星临。眷恋来年思，嫵婉今夕心。泠泠仙风过，时闻清吹音。曾楼设华宴，皎月堕芳斟。明镫架飞阁，列坐理瑶琴。纤纤素手弹，凄凄《白头吟》。繁华当此夜，欢乐轻千金。如何穷达士，独抱忧思深。即事感我怀，慨然念古今。悟彼山阿人，玄默诚可钦。<sup>③</sup>（曾彦《苏州七夕同子馥泛湖》）

七夕时节，张祥龄、曾彦夫妻二人泛舟湖上，观赏湖中月景的同时，亦表现了二人情深义厚的夫妻感情，“繁华当此夜，快乐轻千金”，赋予此次游览之行更加深刻的意义。不同空间文化景观的描写成为家族女性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同时流动中的空间体验也激发了家族女性对于人生的思考，促使她们以一定的文学手段与方式呈现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说，空间书写能够有效提升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与精神价值。

## （二）从宦过程中的空间书写

随夫赴任的“从宦游”是家族女性空间流动的最普遍形态。“三十随夫四海游，江山奇处每勾留。”随夫游历的机会使得女性可以接触到不同社会空间的山水风物，这不仅意味着家族女性有更多机会走出深闺，在领略自然山水之美的同时，还能够接触到复杂的社会文化。如梁德绳，自幼随父仕宦于粤、闽、荆楚等地。嫁于许宗彦后，复游浙粤等地，晚年就养于四子任所。其空间流动的经历，可谓是“身行万里半天下”，其文学创作“且得江山之助”<sup>④</sup>。山水云物对于女性心灵的涤荡以及熏染，深刻影响了家族女性创作风格的形成，正所谓“烟墨所染，自成馨逸”<sup>⑤</sup>。恽珠“从宦就养所至，修葺道途祠宇，不可胜数”<sup>⑥</sup>。张縉英更是道出了随宦生活与闺内生活的重要差异：“去亲远从宦，千里适京邑。平生处深闺，未识世途仄。山川契幽赏，朱紫那可及。”<sup>⑦</sup>借由从宦这一活动，使家族女性得以接触到山川的秀丽风景、社会的百态情状以及历史的深刻变迁，而这些人生阅历的积累是深闺生活无法企及的。

## （三）谋生过程中的空间书写

“谋生游”即女性以闺塾师的身份为赚取家用而进行的流动活动。作为空间流动的主要形式，闺塾师不仅突破了一般人对于女性固有的角色期待，丰富了家族女性的生命经历，同时也为家族女性的

①[清]王慧：《凝翠楼集·跋》，常熟朱氏银槎阁，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刻本，第1页。

②[清]余希婴：《余氏五稿·咏梅吟草序》，清咸丰九年（1859年）刻本，第1页。

③[清]曾彦：《桐风集》，受经堂，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刻本，第29页。

④[清]梁德绳：《古春轩诗钞·传》，清道光二十九年（1894年）刻本，第2页。

⑤[清]梁德绳：《古春轩诗钞·序》，第1页。

⑥徐乃昌：《闺秀词钞》（卷五），南楼小檀栾室，清宣统元年（1909年）刻本，第1—2页。

⑦[清]张縉英：《澹菊轩诗稿》（卷八），《阳湖张氏四女集》，宛邻书屋，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刻本，第5—6页。

空间生产和空间实践提供了优越的环境和素材,即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不同地域空间文化的碰撞而导致的创作精神和心理的复杂等内容,这一现象在明清易代之际尤为多见。江南地区的部分闺秀迫于生计,走出家门从事谋生活动。例如嘉兴黄氏家族的黄媛介,“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橈李,蹶于云间,栖于寒山,羈旅建康,转徙金沙,留滞云阳,其所记述多流离悲戚之辞,而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既足观于性情,且可以考事变,此闺阁而有林下风者也。”<sup>①</sup>通过诗歌记述了其辗转于橈李、云间、建康、金沙、云阳等地谋生的人生历程,这一空间书写既有流于性情的悲戚之辞,也有家国事变的真实记录,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以鬻诗售画谋家族生计的同时,以自身学识教授女子读书,开闺塾师风气之先,也起到了重要的文学传承作用。

与“宦游”相比,“谋生游”更具有独立自主的实际意义。可以说,闺塾师作为女性摆脱传统空间束缚的绝佳方式,在流动性的过程中,不仅扩展了家族女性的社会活动空间,促使她们建立起广泛的文学交游网络,而且也有利于她们在文学上日益精进以及声名的传播。凭借文化资本谋生的生活方式是清初家族女性活动的一个新方向,也是清代家族女性空间书写不同于以往时代家族女性的独特之处,社会大众也普遍认可和接受了家族女性的这一谋生方式。一方面,闺塾师自身具备足够的文学与才艺素养,拥有成为书香世家延请对象的诸多条件。如王采苹,“实承母教,多挺艺能”,“其遇愈穷,其诗益工,屹然为同光闺媛中一大作手”<sup>②</sup>。另一方面,“闺塾师”这一新的女性身份,虽然是对“男主外、女主内”、“内言不出于阊”等传统格局的挑战,但是她们以学识谋生的行为并没有受到过多的非议和指责。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后期,闺塾师被认为是“母教”的一种延续,家族长辈更愿意延请女塾师来教授家族女性,“以女子教女子,授受亲而性情洽,其理更顺,宜乎信从者众,而诗词遂得以流传也”<sup>③</sup>,为清代中叶以后女性教育以及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 (四) 结社过程中的空间书写

文人结社最活跃的地区通常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自前明崇祯初至本朝顺治末,东南社事甚胜,士人往来投次,无不称社盟者。”<sup>④</sup>清代文人结社以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为轴心,多集中于经济繁荣、文化活跃的城镇,如苏州、湖州、杭州等地。重要的是,人才辈出的江南市镇,在科举昌盛的清代,为科举人数集中区,兴学育才氛围浓厚,书院教育也得到蓬勃发展,为文人聚集提供了活动场所,促进了文人结社活动的展开,这同样也深刻影响了家族女性的聚会结社。家族女性之间的密切往来,为来自相同或不同家庭的女性提供了相聚娱乐或学术探究的场合。家族女性的交流也由家族内的亲属关系,逐渐扩展到同乡的闺中好友、诗社成员、同随一师者等较为复杂的社会性关系,促进了诸多文学社群的涌现,这一现象以清代江南地区尤为多见。社团成员的创作也必然会带有不同地域文化因素的交流与碰撞,空间书写在这里就呈现出更为多样化与复杂化的特性。

其一是家族型的才女结社,才女群聚联吟大多是在有血缘关系的亲眷间进行,以家族内部空间为创作范围,这是女性结社最自然的一种形式,诗社数量也最多。其中以常州张氏一门的棣华馆课社、常州左氏一门的浣花诗社、武进钱氏一门的浣青诗社为代表,以家族血脉与联吟为基础,在家族男性的影响与指导之下,定期在家族园林内举行唱和活动,空间书写以较为固定的唱和主题为主,较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被收入于家集中,以彰显家族文化的实力。

其二是地域型才女结社,即因长期生活在同一地区空间而有机会聚集活动的才女群体,以清溪吟

①[清]姜绍书:《无声诗史》,嘉兴李氏观妙斋,清乾隆五十九年(1720年)刻本,第8页。

②王蕴章:《然脂余韵》(卷六),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九年(1920年),第77页。

③[清]归懋仪:《绣馀续草·序》,《江南女性别集初编》,合肥:黄山书社,2008年,第662页。

④[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36页。



社、蕉园诗社、绿风仙花唱和群为代表。此类结社活动已突破家庭空间对于女性的束缚,虽紧密程度不及家族型女性结社,但呈现出更加开放自由的文学交流方式,主要通过设立社约的形式来建构和维系结社活动的进行。特定地域才女的空间书写更能够展现特定地域独特的文化环境以及在此影响之下,成员之间不同文学思想的碰撞,展现女性文学创作受同一地域不同文化因素影响而产生的分异。

其三是师门型才女结社,清代女性审美向“才学”方向倾斜,促使一部分男性文人支持和引导女性诗社的发展,甚至直接招收女弟子,其中以随园女弟子、碧城仙馆女弟子、榕皋女弟子为代表。在文坛具有一定地位的男性文人提拔与奖掖之下,不仅有利于提高才女的创作兴趣和诗词技艺,还使她们能够以同一师门的形式开展交流活动。两个师门型女性结社分别编有《随园女弟子诗选》及《碧城仙馆女弟子诗》传世,对于女性群体或者个人诗名的传播相比其他类型更具有优势。师门型社团空间书写的突出文学表征是男性师长与女性弟子之间的性别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多元文化空间的碰撞与融合。

其四是社交型才女结社,此类诗社不仅脱离了家庭游乐的痕迹,而且也相对摆脱了男性文人的扶持,可以说是真正成熟的女性诗社,其中以秋红吟社为代表,《听秋轩同人集》《蕊宫画史图》分别代表了社交型结社活动的两种典范形态。两大群体各自所代表的江南与京城两大地域空间与满汉之间民族文化的交流赋予了她们空间书写更加丰富的内涵与历史意义。

诗社成员多以题画作序、雅集聚会、拟题唱和、课题品评等形式扩大彼此之间的交流,满汉才媛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交谊,同时也反映出一种培养女性人才以及赞助女性文化创作的新意识。这不仅是明清以来女性诗社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清代女性文学繁盛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不仅代表了女性结社质的飞跃,而且更能够清晰地展现不同地域空间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才女的空间书写真正从家庭、地域、师门逐渐扩展到了整个社会的层面,突破了以往家庭、地域、男性、民族的束缚,使得女性文学的发展真正具有普遍性价值。

以女性生活的现实空间为基础,通过不同社会与文化空间的碰撞,为家族女性提供更多接触不同空间内多元社团形态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家族女性的生活空间与见闻视野,同时也展现了家族女性借由文学吟咏而超越家庭空间限制的实践过程。从前代所展示的被儒家规范压迫和束缚的女性形象跳脱出来,向社会展示了一大批真实个体精神的女性形象。在此基础上的文学创作,更多地展现出活泼多样、内蕴丰厚的风格特点。家族女性通过对现实空间中流动性人生经历的记录和描写,或表现因随宦游而拓展的眼界与心胸,或感慨因随宦游而经受的人生历练,或强调因随宦游而丰富的文学创作<sup>①</sup>,充分证明了空间书写已成为促进与活跃家族女性生活及进行文学创作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文化机制。

## 二、个性化的空间书写特征

文学表现离不开空间形式,它必须通过具体的空间形态来建构作品,因此在出行远游的过程中,无论是山水虫鱼、风花雪月,还是沿途所见的佛寺道观、碑刻造像、市井风俗,都被家族女性作为隐喻化的空间符号表现在文学创作中,描绘出一系列广阔的游历轨迹和现实画面,表现了她们对于山川风情的描绘以及亲友故土的思念。不同地域空间的山水风物也因作者思想情感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与个性化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家族女性的寄托观、娱情观,以期实现人与地、心与景的交流和融合,最终确立女性空间书写独特的美学价值。

---

<sup>①</sup>王力坚:《清代才媛的山水意识—以〈名媛诗话〉为考察中心》,《中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 （一）审美对象的丰富性

归安叶氏家族女性创作了大量的纪游纪行诗，蕴含了她们对于不同空间自然山水、民俗人情的感受和思考。李含章（1744—？），字兰贞，幼时随父仕宦南北，嫁入叶家后，亦随丈夫叶佩荪宦游四方，其诗集《繁香诗草》中收录了三十余首描写其路经山西、湖南、河南、江南等地的诗歌，如：

《常州道中口占》：西风飒飒送行舟，又过兰陵古渡头。路已近家翻觉远，人因垂老渐知秋。回头京洛空尘迹，此地湖山有旧游。太息年来归计缓，夕阳枫叶不胜愁。<sup>①</sup>

《重至都门》：廿年旅梦系京华，此日重看北地花。每历旧游疑隔世，暂休征旆当还家。安心莫问门如水，容膝何嫌室似蜗。剧喜青藜光彻夜，八驺人漫说官衙。<sup>②</sup>

《陕州道中》：丰铃响入霖烟中，去路苍茫接近空。官树阴迷鸿雁月，长河怒卷纽鱼风。乱山积雪千层白，古塔烧灯六面红。异地不堪愁思积，千家寒砧正匆匆。<sup>③</sup>

通过对兰陵古渡头、常州湖山、陕州古塔等代表了不同空间特有风景以及昔日游历人生记忆的描写，表达了作者旧地重游的惆怅、处处不离“家”的思念以及年华易逝的彷徨之感。在不同空间地理环境的冲突之下，“渡头”“古塔”“夕阳”“枫叶”等带有离别伤感意味的空间符号，更容易激发女性细腻多情的内心世界，抒发作者因触景伤情而产生的离愁别绪是流动状态下家族女性空间书写的主要内容。不同于一般女性的无病呻吟，清代江南家族女性借由亲身经历的宦游生活，表达宦途艰辛、羁旅客愁的情感体验，空间书写中所蕴含的思想境界已远高于以往。

陈长生，字嫦笙，太仆寺卿陈兆仑孙女，生于北京，其后随父仕宦登州、江南等地，后亦随夫仕宦多地。常年随宦的经历为其空间书写提供了绝佳条件。《绘声阁稿》中收录了多首陈长生随宦安徽、山西、山东、湖南、江南等地的经历，如《忆旧诗》十章：

其一：髻年何处认芳闺，回首蓬莱梦已迷。海气凉侵衣袂润，乌云浓压画楼低。花间泻露红犹渍，镜里梳鬟绿未齐。镇日牵衣随阿母，幽吟只在曲廊西。

其二：阖闾城下泊轻航，银烛光中促理妆。翠幕千重红菡萏，锦屏七十紫鸳鸯。平安排就金钱字，意可烧残玉鼎香。尽说绿窗春正好，采衣犹喜侍高堂。

其四：回首金陵忆梦痕，衙齐清傍谢公墩。一帘东阁黄昏雨，九日西风白下门。郭外残阳停画舫，篱边瘦菊饯金樽。伶俜始作辞家女，冷月啼乌正断魂。

其八：碧窗曾记绾双鬟，行遍天涯又重还。裙衩绿游沿岸水，镜台青借隔江山。开奁姊觅吟余稿，掠鬓亲怜病后颜。底事牵衣愁远别，罗襟犹染泪痕斑。<sup>④</sup>

在这组诗中，陈长生回忆其在登州、姑苏、金陵、济南、钱塘、吴兴、都门等多地官署的生活经历，不同地域因作者不同时期的人生经历呈现出不同的书写面貌。陈长生在登州渡过了一段惬意悠然的少女生活，闺阁内的“画楼”“花间”“镜里”“阿母”等是这段时期空间书写的主要对象。在姑苏官署时，作者选取了代表苏州城市文化的护城河为书写对象，借一家春日泛舟出行的场景来描写家庭的其乐融融。在其四诗中，陈长生以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的谢公墩作为南京的空间符号，并以“黄昏”“西风”“残阳”“瘦菊”“冷月”等一系列意象表现其身处此地的感受，即离家后的飘零与孤独；其八记其多年后重回钱塘故居，回忆与姊妹亲人相处的往事，现如今愁病交加的生活更是令陈长生感慨万千。这一系列不同生活空间的书写，向我们展示了作者自幼始一幕幕或欢乐、或孤独、或忧愁的人生场景。家

①[清]李含章：《繁香诗草》，《织云楼诗合刻》，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刻本，第29页。

②[清]李含章：《繁香诗草》，第27页。

③[清]李含章：《繁香诗草》，第14页。

④[清]陈长生：《绘声阁续稿》，《织云楼诗合刻》，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刻本，第1—4页。

族女性空间书写审美对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这一组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生活空间带给作者不同的生命体验,外部空间的变化,通过与内部空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作者对于人生价值的感悟和认同,这与普通女性描写单一性的闺阁生活有本质不同。

咸同时期阳湖左氏乃书香世家,家族成员皆以诗鸣于其时,被喻为“浣花之嗣音”<sup>①</sup>。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了左氏七位才女:左锡嘉、左锡璇、袁毓卿、曾懿、曾懿、曾鸾芷、左白玉<sup>②</sup>。这一才女群体以左锡璇、左锡嘉为代表。左锡嘉(1831—1894),字韵卿,号浣芬,华阳曾咏室。善吟咏,工书画,著有《冷吟仙馆诗词钞》以及《曾氏家训》。“刺绣之余,与诸姊习诗画,尤工篇什,当时皆以兰陵绝唱誉之”<sup>③</sup>,有左家娇女之称。左锡嘉的家外交游多发生于同治元年(1862)丈夫去世之后。丈夫的去世,迫使左锡嘉进一步深化了与家外友人,特别是赵佩云、赵悟莲姊妹,庄莹如、庄碧如姊妹,宗婉,萧月楼等人的往来,通过闺阁雅集、彼此探访等形式吟诗唱和,互诉心事,为孤寂的生活增添些许生趣。

赵佩云与赵悟莲为兰陵赵邦英之女。赵韵卿,字友兰,号悟莲,吴县潘曾莹妻,著有《寄云山馆词钞》。赵书卿,字友兰,号书卿,“天才俊敏,气韵雅逸,以近日才媛论治,足与花帘相抗衡矣”<sup>④</sup>,著有《澹香阁词》。赵云卿、赵佩云、赵悟莲姊妹,亦称“兰陵三秀”,有《兰陵三秀集》。赵氏与左氏皆一门风雅,才女辈出。从《访悟莲晚归》《梦访赵悟莲寄此代柬》《新居感作呈陈季婉、赵悟莲》《桃园忆故人·寄赵佩云、赵悟莲》等作品可知,左锡嘉与赵悟莲以翰墨结缘,情比金兰重,“故人怜寂寞,殷殷常枉顾”<sup>⑤</sup>,此份友情可比岁寒松柏。左锡嘉“镇日酬书画,先期计米盐”,“饱偿儿女债,恐负古人心”的守寡抚孤生活使其“零泪满衣襟”、“星霜两鬓添”<sup>⑥</sup>。幸有闺友相伴相慰,“酌我郢莆酒,酒波泼浓黛。荐我青精饭,淡中识真味。告我时世艰,古道久芜废。赠我白完善,报以苍玉佩。”<sup>⑦</sup>充满了对于赵悟莲“差慰离肠”<sup>⑧</sup>的感恩之情。左锡嘉与庄璧如、庄莹如姊妹的交往,可追溯至左氏家族与庄璧如夫家缪家的关系。左氏与缪氏乃蜀中旧识,左锡嘉称缪荃孙为“表弟”,缪荃孙在《艺风堂文续集》中亦有言:“荃孙与左有连,在蜀时,太夫人叙及戚谊,余妻庄思琇亦能画,实就正太夫人,气谊之孚,几同骨肉。”<sup>⑨</sup>缪荃孙妻庄莹如,名思琇,元和人。庄碧如乃庄莹如姊,二人为庄裕崧女。庄裕崧,字少甫,阳湖人。精绘事,尤长山水、花卉。庄氏姊妹继承家学传统,皆善诗画。左锡嘉以“萍逢知己”与“相逢意最殷”来形容自己与庄氏姊妹的密切关系,并以姊妹二人“双福慧”与己“染尘氛”进行对比,赞赏二人“澄怀天地小,放眼海云宽”、“有儿成父志,玉立白珊珊”<sup>⑩</sup>、“四美无不具”<sup>⑪</sup>之形象。与庄氏姊妹相交,在一定程度上抚慰了左锡嘉因丈夫去世,远离家乡常年忧伤的心灵。

## (二) 审美感受的复杂性

家族女性主要通过聚会、结社等形式吟咏唱和,与他人形成精神空间的互动,并在空间书写中呈现出复杂的审美感受。《棣华馆诗课》是阳湖张氏家族第三代家族女性重要的文学唱和成果,集中收录了张氏六女,即王采苹、王采蘩、王采藻、孙嗣徽(王采蓝)、张祥珍和李雯的诗歌960首,共二十

①[清]曾懿:《古欢室诗词集·序》,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刻本,第7页。

②[清]李澹之:《清画家诗史》,北京:中国书店,1983年,第516页。

③[清]左锡嘉:《冷吟仙馆诗稿》(卷八),曾光煦晋宁官署,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刻本,第20页。

④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台北:鼎文书局,1971年,第515页。

⑤[清]左锡嘉:《冷吟仙馆诗稿》(卷六),曾光煦晋宁官署,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刻本,第1页。

⑥[清]左锡嘉:《冷吟仙馆诗稿》,第19页。

⑦[清]左锡嘉:《冷吟仙馆诗稿》(卷七),曾光煦晋宁官署,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刻本,第12页。

⑧[清]左锡嘉:《冷吟仙馆词》,《小檀栾室汇刻词》(第七集),南陵徐氏,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刻本,第12页。

⑨[清]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57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第187页。

⑩[清]左锡嘉:《冷吟仙馆诗稿》(卷六),第11页。

⑪[清]左锡嘉:《冷吟仙馆诗稿》(卷七),第14页。



卷。诸人常针对四季之人、事、物展开吟咏,如《咏物》六首、《咏月》十首、《寒柳》八首、《春草》五首、《秋景》二十四首、《四时词》十六首、《消寒分咏》等,将文学创作日常生活化、情趣化,展现出对于诗歌创作的高度热情,也从精神空间上建立了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六人共同参与创作的诗篇有《怀孟缙》<sup>①</sup>、《闺中杂事诗和孟缙》<sup>②</sup>、《题见津先生洞庭更生图册》<sup>③</sup>、《偕之二十初度赋赠》<sup>④</sup>、《紫畦二十初度赋赠》<sup>⑤</sup>等。以《怀孟缙》为例,采苹与祥珍通过回忆往日棣华馆课读场景,“华馆联吟似旧时,疏帘月上漏初迟。”(采苹)“幽窗课读犹如昨,忽忆相逢晓梦中。何时重见大姑回,华馆清幽绮宴开。选韵联吟寻常乐,不须更盼雁书来。”(祥珍)抒发对于孟缙从母的思念之情。采蘩、李雯则通过季节的变化,“那堪杜宇催归急,二月春波送客行。千章浓绿一庭深,几日离怀已不禁。触暑最难孤艇客,棹歌声里独长吟。”(采蘩)“送暑迎秋最怆神,月明人静夕花新。”(李雯)展现对于孟缙的离怀之情。嗣徽与采藻则着意营造思念孟缙时空冷寂寥的氛围,“灯昏月落冷帘钩,梦逐征帆诉别愁。千里江天消息断,更无雁字过南楼。”(嗣徽)“灯暗香消冷素帷,空梁落月梦回时。遥知千里燕台客,一样无眠听漏迟。”(采藻)表现梦里相见,诉说衷情的离愁之情。通过诗歌创作彼此互动品评,表达对于长辈的感恩与怀念,有益于家族女性真切思想的表达,以此获得情感上的互动、交流与认同。这一空间书写的唱和模式得到了其时社会的普遍肯定和赞扬,形成了“客有闻者,多索观疲于抄写”<sup>⑥</sup>的局面,可见互动性的空间唱和给家族女性带来的声名传播上的积极影响。

乾隆年间,以张允滋为首的清溪诗社,成员皆出自名门世族,且互有亲属关系,在此基础上,又以地域空间为辐射,众人多为江苏吴县人,且有“吴中十子”之称。清溪诗社因张允滋字清溪而得名,其对诗社成员的影响可想而知。沈纘曾云:“余初不喜填词,相馈之余,停针之暇,惟斤斤于无言字中。……后与清溪张姊交,观其填词,能移我情。岁戊申,始研心音律。自唐迄宋,诸名家词,靡不手自钞录,兴之所之,恒彻夜忘寝。”<sup>⑦</sup>可见精神空间的互动关系直接促成了家族女性积极投入到文学创作中,或者说文学创作对于女性精神空间的表达直接激发了家族女性的创作热情,最终形成了女性文学的兴盛。

诗社在张允滋丈夫任兆麟的组织之下,经常举办社课、雅集聚会等活动,如张芬、席蕙文以及朱宗淑三人,曾以《虎邱竹枝词同席姊耘芝作》《虎丘竹枝词同张妹紫蘩作》《虎丘竹枝词三首同席耘芝、张紫蘩诸君子作》三首“竹枝词”互和,并题有“林屋吟榭课”诸语。雅集方面,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

香奁小社,拈险韵以联吟;花月深宵,劈蛮笺而酬酢。并翻五色之霞,奇才倒峡;互竞连珠之格,彩笔摩空。接瑶席而论文,宛似神仙之侣;树吟坛而劲敌,居然娘子之军。丽矣名篇,美哉盛事。<sup>⑧</sup>  
又乾隆五十四年(1789):

月满花香,夜寂琴畅,珠点夕露,翠湿寒烟。于是御流霞之杯,倾华靖之宴,饮酒赋诗,诚所谓文雅

①采苹、采蘩、采藻、嗣徽:《怀孟缙从母》,祥珍:《怀孟缙姑母》,李雯:《对月怀孟缙恭人》,《棣华馆诗课》(卷二),武昌:棣华馆,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刻本,第3—4页。

②采苹、采蘩、采藻、嗣徽:《闺中杂事诗和孟缙从母》,祥珍:《闺中杂事诗和孟缙姑母》,李雯:《闺中杂事诗和孟缙恭人》,《棣华馆诗课》(卷六),武昌:棣华馆,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刻本,第4—6页。

③采苹、采蘩、采藻、嗣徽:《题族舅氏张见津先生洞庭更生图册》,祥珍:《题见津族父洞庭更生图册》,李雯:《题见津先生洞庭更生图册》,《棣华馆诗课》(卷六),武昌:棣华馆,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刻本,第12—14页。

④采苹、采蘩:《偕之大妹二十初度赋赠》,采藻、嗣徽:《偕之大姊二十初度赋赠》,李雯:《偕之公子二十初度赋赠》,祥珍:《二十初度感事述怀兼答家大人暨诸尊长姊妹赠诗》,《棣华馆诗课》(卷八),武昌:棣华馆,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刻本,第8—9页。

⑤采苹、采蘩、采藻、嗣徽、祥珍:《紫畦二十初度赋赠》,李雯:《二十初度婉娴、若绮夫人,洞香师,管香、少婉、筠香、偕之诸女公子均以诗见》,《赠主人示赐七绝十四首赋此志感》,《棣华馆诗课》卷八,武昌:棣华馆,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刻本,第9—12页。

⑥[清]张晋礼:《棣华馆诗课·序》,武昌:棣华馆,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刻本,第1页。

⑦[清]沈纘:《翡翠楼·自叙》,《吴中女士诗钞》,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刻本,第1页。

⑧[清]江珠:《青藜阁·自叙诗稿简呈心斋先生》,《吴中女士诗钞》,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刻本,第1页。



之盛,风流之事者矣。况夫君子有邻,名流不杂,授翠裾而列坐,俯盘石以开襟,终燕一夕,寄怀千载。是时也,莫春骀荡,初夏恢台之交耳。<sup>①</sup>

将社团拈韵联吟、饮酒赋诗的活动称为是风流盛事,通过诗歌唱和寄怀千载,互竞连珠,其中不乏“奇才倒峡”、“彩笔摩空”的作品,其文雅之盛,可“接瑶席而论文”、“树吟坛而劲敌”。具体而言,清溪吟社的空间书写多以题咏、论诗、评画为主,一题分咏,体式不一,有赋、诗、四六文、词诸体,且附有评论。如《翡翠林闺秀雅集》中,收录诗社成员创作的《白莲花赋》、诗、四六文词等,由任兆麟加以评定“超取”与“优取”者,可知社团活动中的文学创作亦含有切磋互动,甚至竞赛之性质,鲜明体现出空间书写中家族女性文人多元的审美感受。另一方面,充分肯定了雅集聚会给女性文人提供的交流互动机会,空间书写指引了家族女性文人的创作,在促使其创作“丽矣名篇”的基础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家族女性的文学创作力和生命力,丰富女性文学的个性化价值,也成为了清代诸多女性社团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空间本身既是社会生产的产物,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以及社会关系组合而成,同时又作为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指引着女性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形成的多种可能性。不同地域环境的空间书写,使得家族女性在互相认同的过程中寻求到情感和体验的深度交流以及对于地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确立女性文学个性化风格的形成,而且也有利于彼此诗作和诗名的传播,才名的确立成为可能。从清代乾嘉时期开始,家族女性开始积极拓展家外的交游空间,特别是与男性文士的文学互动,试图通过其时男性文人的关照来扩大自己或群体的可见度与公众性。可以说,家族女性互动性精神空间的拓展,开创了清代女性空间书写的新模式。

### 三、女性空间书写的独特价值

当空间进入流动的状态时,流动就不仅仅是一种空间状态,还是一种空间属性,使得原本静态的空间实践开始转化为具有变化性,包含诸多状态和关系的空间实践。家族女性不管是以何种目的参与到自身、家族、地域的空间流动中,她们都或多或少受到不同空间内复杂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文化背景的影响。清代家族女性文人的生活空间得到了极大扩展,一方面来自宽松的时空氛围,特别是明中叶以后“情”与“礼”的冲突,表露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吴中地区“尚文”与“富足”的文化特点,既造就了人才辈出的景象,亦不断刺激吴中文人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改变。家族女性以“闺秀”、“才女”、“名媛”的身份,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与家族女性成长的家庭环境,父辈夫婿的社会地位,以及家人的支持态度有很大关系。正是由于“内在空间”与“外在空间”的相互联系与碰撞,才致使家族女性获得走出闺门的机会,得以扩展人际交往的范围。她们既可跨越家族内外的界限,丰富原本一成不变的家族生活,也可在不违背家内角色下,在女儿、妻子、媳妇、母亲身份基础上,兼有“女文人”、“名媛”或“闺塾师”等角色,大方介入以男性为主的文学活动和工作中,得以施展自身的才华。通过刊布作品,为知音同好撰序,并借由名士的推荐,以提高自己作品的知名度,在一定程度上展露显才扬名,欲以才服人的企图心,开创了中国古代女性交游与创作的新局面。

清代江南家族女性的空间书写特点,主要体现为审美对象的多样性、审美感受的丰富性以及诗歌境界的日益高迥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不同空间以及不同空间内自我身份的认知。女性在地域空间中的流动,恰好能够说明女性存在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通过文学作品,反映家族女性的情感轨迹和思想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女性成为一个多重关系交织在一起的组合体。对于家族女性而言,游历不仅仅是单纯的观

<sup>①</sup>[清]沈纘:《林屋吟榭·翡翠林雅集叙》,《吴中女士诗钞》,第1页。

看活动,而是自我与外部空间的体验与感受的过程,在不同空间中,加深自我主体意识的深度和广度,形成对自我主体的重新塑造。由原本局限于家庭的“私领域”,扩展到与社会文化结合的“公领域”层面,是女性寻求个体价值的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同时也是女性文学空间流动性的真正意义所在。

但不可否认的是,空间充满了各种意识形态,而家族女性作为主流社会空间之外,相对边缘化的异质空间,包含了彼此矛盾的多个空间状态。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自古有之。家族女性与青楼名妓的最大区别,即体现在现实空间中生存、流动空间的大小,空间体验上的复杂程度,以及在精神空间上互动性的生产创造能力和风格倾向。高彦颐曾说过:“那些有着最大身体流动性的女性,也是最依赖男性的;那些行动最受限制的,也是在被限定的世界中最自由表达和追求自己愿望的。”这段话虽然是从对比的角度探讨女性活动空间对于自由表达思想愿望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家族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仍然存在,不管是家族内的男性家人,还是家族外的男性文士。由于家族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  
高,家族女性的创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扩展,并建立起了一定范围的交游网络,在精神空间上也获得了更多的互动和认可,展现了家族女性对于自身价值新的认识以及寻求社会认可的期待视野。

女作家对女性主体性的艰难建构,远未足以形成扭转男性中心文化专制局面的力量。倒是女性在写作中的诉说自我欲望这一女性发现自己的主体性建构行为,在男性消费眼光的窥视下,很容易地就蜕变为对女性自我的异化事件,反过来消解了女性主体性。受市场利益原则驱动,某些女作家也自觉不自觉地  
把女性欲望演化为取悦男性欲望的工具。<sup>①</sup>

对于男性文人的模仿、追随、甚至崇拜,是家族女性赢得社会认可和接受的重要途径。或为了迎合文士的喜好和兴趣,在创作中刻意营造某种气氛或假象,或出于对某位名家的过分崇拜、模仿,压抑自我心灵真实的情感表达,作为迎合、利用男性文人对女性文学的推动方式,表现诸多近似于虚假的情怀,这种创作实践的产生以及创作风气的形成严重阻碍了女性文学的发展。这是家族女性在创作中必须正视以及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如果不能实现创作主体角色意识的转换,女性文学也无法在古代文学中占领应有的地位。

在家族中传统的女性角色意识以及“主中馈”家庭职责是家族女性书写的重要内容,将日常生活纳入到文学创作中,其中对于传统角色的不安与焦虑呈现出女性个体生命意志的觉醒以及对于实现个体价值的需求。家族内外生活空间的拓展,对于家族女性而言,如何调节自身在家庭中为人女、为人母、为人妻、为人媳等角色身份与文学创作的追求是她们面临的首要难题。“女性对闲暇时间的支配及其闲暇活动方式,是女性社会地位与进步程度的反映”<sup>②</sup>,对于清代世家大族中的女性来讲,其闲暇时间用于文学创作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也是家族女性与普通女性的最大区别。那么,如何控制或支配女性家庭职责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成为决定女性社会地位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准。家族女性在婚后主要有两种人生方向的选择,一种是结束“知识女性”的身份,放弃文学创作。在众多女性传记中,对于她们的记载往往以家庭角色的职掌和家庭身份的诠释为重点,从孝、义、节、烈等角度,展现女性在侍奉公婆、相夫教子等方面的能力。而对于文学活动的描写以及文学成就的评价则鲜少提及,或仅以寥寥数字作结。另一种是将自身才华与学问融合到新的家庭角色中,在扮演好妻子、媳妇、母亲角色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成为丈夫的闺中良伴以及儿女的家庭教师。江苏武进刘氏的虞友兰“于针黹外,通习古今,博综群籍,喜为诗。兄弟间多所唱酬,落笔辄翩翩有致。于归后,舅姑伉俪嫡姒间,各遵礼法”,“一切琐悉之务,皆太宜人身任之。暇即展玩书史,凡古人之事之可法者,每切究将明,而儿辈勖。”在“主中馈”之外,能够很好地协调履行家庭妇女职责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孝敬传庭围,勤劳及

①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4页。

②田翠琴:《农村妇女发展与闲暇时间的性别不平等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9期。

井臼。有蕢宜其室,采藻奠之牖。时于妇职闲,卷籍陈左右。胸中汇古人,本末毫端剖。量比上官秤,才希陈思斗。耽吟兼各体,正始法能守。辛勤惯课儿,熊胆和忆柳”<sup>①</sup>。诚如翁方纲所说:“礼之明妇顺者,列言于德之下,容功之上,以言亚乎德,重乎容功也,而言非徒口说之。谓苟能于妇职余间,流览典籍,形诸咏歌,因以抒写性情,发挥义理,即于治家相夫课子亦非无助。”<sup>②</sup>肯定妇德与才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双轨并行。

《鹂吹集》前的五篇序文,可看作是沈宜修的人生传记。从性别视角看,叶绍袁、沈自微、沈自炳三人的序言主要表达了“先言德后谈才”的观点,沈自微以传统“主中馈”的角色职掌,对沈宜修肩负“媳妇”、“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做了概括,凸显其姊淑德丽才的形象,表露出“男主外,女主内”之价值观念。而沈大荣则是以“先扬才后美德”角度展开叙述,透过对叶纨纨、叶小鸾才情的赞扬,以及对姊妹俩去世的叹息,从中细说沈宜修玉折之因,从而达到显扬其文才之目的。从男女侧重点的不同,可以看出家族男性与女性对沈宜修角色执掌的评价。

沈宜修既认同自己扮演的角色,也不自觉让自己成为父权社会下所期望的一种典范,并不时以男性心中“贤惠贞淑”的女性形象审视、规范自己的行为。所以,在处理家庭事务与文学创作上,可以做到很好的平衡,这一结果也得到了家族男性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内言不出”强调女性的身体和语言都应该被限制于家庭的空间内,如果说沈宜修还只是语言的“出闺”,那么清代嘉庆以来,逐渐出现的新型闺秀旅游,或相约节日饮酒赏花,或登山泛舟,或出游访古探幽,以娱乐助兴、诗艺切磋、扩大交友网络为目的出游聚会,则真正代表了女性身体的“出闺”。从乾嘉时期开始,家族女性纷纷走出家庭,积极与家外文士进行文学交流和批评,这一文学交游网络和空间书写的拓展不仅极大丰富了女性诗人的精神生活,而且对于提高作者和作品的影响力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清代女性文人尽管拘囿婚后多重身份角色,仍可借由酬答唱和的方式,互表关怀,分享生活情趣,在文学创作以及空间书写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特别是江南家族女性,既能以不让须眉的才情,突破符合“四德”和“正位于内”传统要求的理想妇女现象,大方步出闺门,活跃于向来属于男性的“家外”空间;也能在遵循“妻”与“媳”的角色前提下,通过诗词创作,丰富原本单调且乏味的“主中馈”生活。内外重叠的社会身份,以及多元化的空间书写,造成传统“男外女内”界限划分的模糊,乃至“主中馈”角色执掌的逾越,有别传统的鲜明言行,具有一定的突破意义。

空间的意义并不仅限于现实物质性的地理环境,而是具有历史的、心理的、文化的多重意义,所以在流动性的空间体验基础上,家族女性的文学创作,也是一种互动性的空间生产。通过精神空间的生产去表现个人真实的生活感受,使女性从身体感觉层面,到意识或精神层面,进而到社会交往层面,与所在空间进行有效地交流与衔接。如果说流动性的现实空间,是女性自身物质生活的一部分,是女性文学创作环境形成的基础空间,那么互动性的精神空间则是家族女性之间以及女性群体之间交游关系得以确立的依据,是一个不断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而实现精神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通过精神层面上的沟通交流,充分展现个体的思想认识和生命价值,其中蕴含了多方面的深层意义。空间给予了清代家族女性更为多元的创作环境,促使其有机会接触更为多样的文学创作对象,从而激发她们产生更为丰富的审美感受,提高她们创作思想的深化以及创作技巧的娴熟。这就是空间给女性文学创作所带来的社会性价值以及文化价值所在。

空间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空洞的存在,而是人类社会生产实践的结果,同时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人类的世界。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总是隐匿着这个社会的空间;空间实践以

①[清]虞友兰:《树蕙轩诗钞·题词》,《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30页。

②[清]虞友兰:《树蕙轩诗钞·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3册),第827页。



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的方式预示并呈现出这个空间；它缓慢而确定地生产这个空间，就像它控制并占据这个空间一样。从分析的立场来说，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是通过对其空间的破译得到揭示的。”<sup>①</sup>以不同方式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空间，都与人们特定的生存方式、社会结构以及思想观念息息相关。而文学“直接参与空间性、社会性、历史性和人文性的建构，赋予空间以意义和价值内涵，并达成人与空间的互动交流，显示空间的生存意蕴”<sup>②</sup>，成为家族女性空间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家族女性凭借集会、结社、闺塾师等方面呈现其文学书写空间的扩展，既助长了家族女性对于文学创作的热烈追求，开阔视野的机会，也间接促进了出版业的蓬勃与旅游闲赏之风的盛行。更重要的是，透过才女间的人际互动，不论是性别、阶级和地域的界限，抑或借由书信、诗酒集会的交际方式，以情感交流、礼尚往来、艺文讯息的交换为酬唱目的，以独立的身份构建交游网络，以证明个体生存和文学创作的权利和价值。基于这样的空间经验而形成的流动性地域空间以及互动性精神空间的互补视野下，需要我们正视其中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差异性。在将多个不同类型的、彼此冲突的空间，以一种隐喻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新的文化实践，形成属于家族女性独特的空间书写方式和精神内涵。这正是清代文学家家族女性群体给自身、家族、地域以及整个社会带来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也是家族女性文学在清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证明。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 Writings on Space by Women from Prestigious Families in China's Jiangnan Region in the Qing Dynasty

LOU Xinxing

**Abstract:** Different spatial and temporal environments can produce different personality traits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produced by female writers from the prestigious families formed a specific cultural landscape in China's Jiangnan region in the Qing Dynasty. Women from those big families took advantages of their unique experience gained from their involvement in the governmental, commercial and social activities and created a variety of writings on space, thus forming their personalized type of space writings. Their writing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 diversity of aesthetic objects and the richness of aesthetic feelings. The space form depicted in their writings, to some extent, gradually became the type of space where they expected to live a meaningful life. In their interaction with the space under their pen, they could describe women's complex life experiences, and on the basis of this, reach a cognition of different spaces and their self-identities in those spaces to fully demonstrate an individual's ideological dimension and life value. At the same time, their writings have further deepene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women's literature, and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evidence for the important position held by the female literature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women from prestigious families; space writing; aesthetic value

**About the author:** LOU Xinxing, PhD in Literature, is Postdoctoral Fellow at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sup>①</sup>H.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Blackwell, 1991, p.38.

<sup>②</sup>谢纳：《空间生产与文化表征：空间转向视阈中的文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0页。